清史纂修

略谈清人别集的文献价值

蒋　寅

一

中国自宋代以降，雕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十分发达，不仅皇家、官署、学校藏书丰富，私人藏书风气也很浓厚。在文学创作普及、印刷出版业繁荣的清代，产生数量众多的诗文集并留存于世，本是不难预期的。事实上，清代留下的出版物之多，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企及。但遗憾的是，清代藏书风气极为佞古，只重宋版元椠，明版书都不放在眼里，留心收藏明代诗文集的只有黄虞稷、刘承幹、陈田几人，本朝诗文集就更无人收藏了。除了少数名家集子被人阅读庋藏，或一些稿抄本被留心文献者珍藏，大多数诗文集刊本都任时间淘汰，自生自灭。更兼近代以来，万方多难，传世文献一毁于兵燹，二失于列强掠夺，三厄于“文革”，公私藏书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清代诗文集存世数量也大为减少，许多晚近刊本竟也极珍稀罕见，这使得清代诗文集的收藏极为分散。

以我访读所知，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最为丰富的，其次是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清代后期诗文集也相当丰富。上述图书馆所藏，应已占传世清代诗文集的绝大部分，分散在其他图书馆的部分已不多。海外图书馆所藏溢出上述单位者大约也不会多。京都大学是日本收藏汉籍数量最丰富的单位，所藏清代诗文集溢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本之外者，寥寥三数种而已，而文学所藏书多过京大的就不可计数了。台湾“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所藏也有限，国民党当年撤退时将许多珍贵古籍装运到台湾，清代文籍来不及搬运，都留在了大陆。今天考察和搜集清代诗文集的资料，首选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四座城市。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刘承幹嘉业堂旧藏清集，多稿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邓之诚多年搜罗的清集，以清初刊本为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有张寿镛约园旧藏，益以郑振铎、何其芳任所长期间购自市肆的大量稿抄本、刊本，计清集约三千种。刘、邓、张三位都是晚近致力于搜罗清代文献的专家，他们所藏的清代诗文集多有珍秘之本。

由于清人别集数量众多而收藏分散，学界一直无从判断其总数。直到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问世，尤其是柯氏《提要》著录传世清代诗文别集四万余种，作者一万九千七百余人，这才让我们对清人别集的数量规模有了初步的概念。由于两种目录的收录范围都以存世书籍为限，可以想见它们与清代实际产生的著作数量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即便是现知的不太完全的数字，也足以说明一个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对文学的前

［收稿日期］2010－05－10
［作者简介］蒋寅（195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所未有的需求。实事上，清代文学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根本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写作和出版数量之巨大。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充分利用这种文献优势，以致清代诗文研究长期停留在有限的作家和作品上，徘徊在较浅的层面。这种情形，除了厚古薄今的文学史价值观的影响之外，也与我们对清代诗文集的数量、特征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认识不够有关。本文试图根据自己考察、阅读的体会，对清代诗文集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略作论述。

二

清代别集，从内容构成来看，有文集、诗集和诗文集之分，单纯的文集较少，单纯的诗集数量最多，诗文兼收的别集介乎两者之间，往往是作家的全集。试帖诗和八股文一般单行，如今日学生作业，不入别集。偶尔也有作者不忍割舍、附入别集的，究非常例。清代虽已届刊本时代的末造，但因时间较近，留下的稿抄本数量颇多，其内容构成、流通方式和文献价值都与刊本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先说刊本。清代由于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刊行作品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或一事刊一集，多为纪行、纪游之类，如王渔洋出使广州和陕西、四川，祭祀南海、西镇岳渎，所作编为《南海集》、《雍益集》；或一官刊一集，如宋荦在虔州视赣关榷时有《双江唱和集》，孙元衡任台湾府通判时有《赤嵌集》；或一年刊一集，如王渔洋早年的小集《丙辰集》、《甲寅诗》。这类集子篇幅都不大，取其快捷易成，一般称小集。或出使远游，登览吊古，或经历事故，人情翻覆，小集总有其异域背景或新闻时效，为朋辈乐观，稿本往往在同人间传阅，而作者也总是请读者随时批点或作序跋。这样，小集就保留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清初的小集，尤其保留了许多序跋和评语，可见一时风气如此。王渔洋早年所刻《焦山古鼎图诗》、《白门前集》、《入吴集》、《秦淮杂诗》、《白门后集》、《阮亭壬寅诗》、《阮亭甲辰诗》、《退寻草》、《游西山诗》等，都有当时名家的序跋。如康熙三年（1664）刊《阮亭甲辰诗》一卷，有前朝遗老林茂之序，后有诸家评语。康熙十一年（1672）刊《游西山诗》一卷，有严绳孙、曹禾、汪懋麟序。顺治十八年（1661）刊《金陵游记》一卷，收江南游记十五篇，篇幅寥寥，却冠有杜濬、陆圻、施闰章、冒襄、尤侗、陈维崧六位名家的序言。这些序跋和评语保存了当时的写作背景和最初的读者反应，是最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涉及作品写作动机和本事的细节。到编合集时，有的序跋就被删去。如朱彝尊顺治十四年（1657）游粤诗草《南车草》一卷，有蔗余道者序，云“自变故以来，诗书之气，无所附丽。天下之才人，往往化为诗人。”此语极有味，而日后编合集，此序不存①。即使合集能保存多数序跋，评语一般也被删削，作品则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当初写作和流传的那个原始氛围不复存在。所以说，小集是文学史和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清代诗文集特有的文献源，研究者应特别注意，深入发掘其中的内容。

清代作家步入文坛，通常都是从刊刻小集开始的。若干小集问世，赢得一定声誉，有了一定地位后，就有了编合集的资本。清初名集往往有合若干种小集订为一册的②，较正式的是选汰重编。王渔洋印行了若干小集后，在康熙元年（1662）由门人盛符升刊行《阮亭诗选》十七卷，系由顺治十三年（1656）至十八年（1661）作品中选一千二百二十二首（据目录为一千二百一十七首）编成，前有李元鼎、黄文焕、熊文举、李敬、林古度、赵士冕、丁弘诲、张九徵、韩诗、王泽弘、蒋超、吴国对、叶方霭、唐允甲、顾宸、汪琬、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杜溹、陈维崧、杜濬、程昆仑、赵进美、丘石常、王士禄二十六人序及自序两篇。康熙八年（1669）又加上康熙后七年间所作，付门人王立极在苏州沂咏堂刊行了《渔洋山人诗集》二十二卷，诗作按年编排，但《阮亭诗选》所收作品又有部分删削，包括顺治十三年（1656）施闰章赴山东提学使任时所呈《历下奉赠愚山学宪十五韵》、《再赠愚山学宪时以越游草见示》。二诗以晚辈自居，语气甚恭，时过境迁，到康熙间

王渔洋与施闰章已平揖论交，甚至在笔记中提到愚山请他论定诗集，语气不无自负，集中不存少作也就不奇怪了。延君寿《老生常谈》曾说 “在墙上见人所黏诗草，案上见人所刻硃卷，论当从宽。盖能中式，能倡和，便好。若是刻了集，是出问世人，便恕不过去。此刊行之不可造次也。然有人吹毛索瘢，想来尚是有斑之豹皮，直得去吹索。绵津似不如渔洋，人能知之。当时有合刻诗稿，人吹索渔洋，不吹索绵津，是绵津死而渔洋不死也。古人谓盖棺然后论定，到盖棺了，人品学问已定，一切功名势位，穷檐陋巷，皆无分别，则真评出矣。”[3]这段话前后讲的是两个问题，前面说诗文一旦版刻行世，就是正式定稿与世人相见，所以要极为慎重。但他接着又强调，其实版行之稿并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成就，真正的评论必待盖棺方能决定。这种看法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不错的，但通常的情形，无论就社会影响还是文坛知名度而言，合集的刊行都是作者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标志。就像邵长蘅刊《渔洋绵津诗钞》，这种由他人编刊的诗选，更意味着作者已是诗坛注意力的焦点，他的选集已足以畅销盈利。事实上，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邵长蘅选刊渔洋、绵津两家诗之前，无锡侯文灿已在康熙三十三年刊行了《渔洋山人诗初续合集》十八卷。侯文灿固然是渔洋故人之子[4]，但渔洋诗若无广大的读者市场，他恐怕也不会倾巨赀刊刻偌大卷帙的诗集。从刊印小集到汇刻篇幅较大的合集，意味着作者已从普通诗人升级为名家，合集让我们间接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坛的辐射力，当然它同时也遮蔽了作者早年生活、写作的部分经历。合集的编纂等于是一次重新洗牌，小集的作品在进入合集时，往往被分体编排，取消了编年，标题常有修改，文字也有所润饰。总之，作品的早期印迹被不同程度地洗去，变得身份不明确。上文强调小集的可贵，道理正在这里，小集保留了作品的原始身份。

当然，也有些作家编合集甚至到晚年编全集时仍尽量保持作品原生态的，如庞垲《丛碧山房诗集》、黄秉礼《绿香山馆诗稿》，按职官履历分卷，保留了当年一官一集的面貌；李馥《居业堂诗稿》也保留了一年一集的形式。不过他们没有小集流传，并不能断定全集确无改易。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晚年汇刻的合集或全集，除利用旧版汇印者——这类集子往往版式杂乱，很不美观，通常都经作者本人或编辑者重加增删润色，使全书内容和文字臻晚年老成之境，少作往往在此时遭删除。有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或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作品的去取。我曾将王渔洋临终前手定的《带经堂集》与旧刊诗文比勘，结果《渔洋诗集》较沂咏堂刊本仅抽去《送张元履之盱眙》一首，而易以《怀余大下第游江南》。想是前诗有“江左前筹失，中都王气空。佛狸南渡日，百战忆英雄”几句，恐致人讪谤，所以掉易之。康熙后期文网渐密，终酿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戴名世案。《带经堂集》抽换一诗，事虽细微，却也是山雨欲来的征候。一般来说，全集虽有涂改历史的不足，但也有保存文献的功劳。全集往往收存小集原载的序跋，如汪士鋐(原名征远)《栗亭诗集》共收十一篇序，其中王士禄序题下注《沧螺集》、《黄山纪游草》、《京口纪游草》，龚贤、程守序下注《黄山近稿》，黄士埙、曹溶序下注《洞庭纪游》；靳治荆二序，一注《黄山近草》；吴绮二序，一注《芜城录别》，一注《谷玉堂集》，都是为小集而作，只有黄宗羲、吴山涛及靳治荆一序是为全集而作。上文提到的《阮亭诗选》所收二十六家序，也有不少是小集原序。有些人的合集将这些小集序统冠以“旧序”之名，列于全集序后。那些小集大部分都失传了，赖全集保留其吉光片羽；有些名家的序跋，不见于本集，如龚鼎孳十四世孙彦绪编光绪九年(1883)刊本《定山堂诗集》，保留序文十一篇，其中钱谦益序两篇，《过岭集序》今存于《有学集》卷十七，而《定山堂诗集序》文集便失收了。

出于作者手定的全集，代表着作者的晚年定论，体现了作者成熟的趣味和判断力，仿佛是作者愿意示人的标准像，而删除的作品则是他力图遮掩的斑疵，所以除少数敝帚自珍的作家，偶尔会在其他的场合比如笔记、诗话提到删去的作品外，多数作家都不愿意别人知道那些被自己剔除的作品，辑佚当然就更难容忍了。说得最深恶痛绝的是郑板桥，其《后刻

诗序》有言："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5]李洽《夜谈追录》载前辈诗人欧阳辂临终前，写诗集刊本需要修改的文字十几条相付，嘱挖改板片，不由得感叹道"后之读先生集者，慎勿以其所手删者窜入集中，亦吟魂所默感也！"[6]从作者的角度说，这么想是很正常的，但后人为存先贤遗文，喜好者欲见其全体，研究者要占有全部材料，势必网罗遗佚，虽零章片句也要珍重收取。即以郑板桥而言，十余年间，卞孝萱先生的新辑本篇幅已倍于旧版。同样，后人编印的全集，一般都较原刊内容丰富，大多辑存佚作，或增益了传记资料。如光绪九年刊龚彦绪编《定山堂诗集》，卷首影刻龚鼎孳手札多通，是原刊本所无的珍贵资料。咸丰元年戴均衡重刊《方望溪先生全集》，增入方苞裔孙恩露提供的诗十五首，弥补了全集中无诗的缺陷，使望溪不能诗的传闻不攻自破[7]。不管从哪方面说，后出的全集都应该是研究者首先使用的版本，因为它包含了后人整理、增订的成果，在学风严谨的清代，像明人编书那样伪造窜滥的情况不敢说绝对没有，但一定是极罕见的。如果是出于名学者编定、整理的全集，那么校勘水平也能得到保证，文字的准确性会比原刊本和合集本有所提高。

四

清代诗文集的流传与前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有大量稿本、抄本传世。现在不少图书馆都将抄本定为善本，实际上抄本的价值要根据其书有无刊本传世及抄本早于刊本还是晚于刊本来决定。现存许多抄本书都有刊本行世，甚至它们本身就是据刊本传抄的。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陈恭尹《陈元孝诗》无格精抄本一卷、吴焯《渚陆鸿飞集》无格精抄本一卷、萧德宣《虫鸟吟》无格精抄本一卷、吴宁谧《桐川乐府》同治五年影抄本一册，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冯登府《石经阁文集》，都是据刊本抄录的，没有溢出刊本以外的篇目。《陈元孝诗》和萧德宣《虫鸟吟》很像是摘抄的读本;《石经阁文集》精抄本各册末有"门人陈宝琛校字"字样，似据刊本影钞。这样的抄本除了文物价值，基本没什么文献价值。当然，有些抄本，因其原刊本流传绝罕，其价值也就非一般抄本可比。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的沈钦韩《幼学堂文稿》抄本八卷与吉川幸次郎先生旧藏抄本一册，就属于这种珍贵抄本，因为《幼学堂诗文稿》道光刊本为"清人别集中最罕遇难求之品，虽近刊而流传绝罕"[8]。至于有批点或校勘记的抄本，尤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批点，当然也属于珍本。鉴于清代抄本的复杂情况，一般谈抄本的价值主要是指无刊本行世或非源于刊本的抄本，其价值略同于稿本。未曾刊行的稿抄本，其文献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有刊本行世的稿抄本，作为前刊本形态的文本，对研究作品的原始面貌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代诗文集有大量的未刊稿传世，甚至有些著名文人，其作品也只有稿本传世。比如清初著名诗人归庄，生前未能刊行诗集，作品散佚，道光间季锡畴辑其遗稿，刊为《玄恭文钞》七卷，版毁于火，其书不传。后人续有辑刊，偶见重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其同异，编为《归庄集》十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归恒轩初稿》抄本二卷，分《归恒轩诗集》与《归衡轩遗集》两部分，前者按体编排，收七古十三首，五绝十首，七绝一百五十三首；后者无次序，共收诗二百一十一首，与前编有重出。校以排印本《归庄集》，可补诗二百零七首、文十二篇，且诗下多注明作年，可资考证。其中诗题及文字与他本略有异同，篇目也经作者删削，如七绝《城陷后二十日访得兄子益孙所在抱之以归口占四绝句》此本作三首，《昆山看梅诗二十九首》此本合两集仅存十七首，《和顾端木先生弃庵十咏》此本仅存六首，《哭二嫂四首》此本作二首，可见是作者删定之本，《归庄集》未能采用，是很遗憾的。归庄毕竟是布衣，诗中多有违忌之语，诗集难以刊行是可以预料的。福建名士李馥，官至浙江巡抚，后罢官流寓吴门，大约艰于生计，诗集《居业堂诗稿》稿本竟也未能付梓。今福建师大图书馆藏六册，福建省图书馆藏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影印问世，已非完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

书馆藏胡廷桂诗稿四卷精写清稿本一册，有丁丑仲夏韦光黻题识，称“凡可刊者以三○两○为别，必不可存者直书删字”，可见是请韦氏选定以付梓者，今未见刊本流传，想是终未能梓行。这样的稿本沉睡在各地图书馆中的还很多，亟待整理抢救，以免毁损湮没。

有些作家的作品生前即已梓行，但有文无诗，或有诗无文，今传稿抄本可补刊本之缺。如清初太仓诗人周肇，吴梅村编《太仓十子诗》选其诗一卷，而文无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周肇《东冈诗钞》一卷补遗一卷文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藏有旧抄本东冈文稿一册，将这两个抄本合起来即可补周肇文集。至于那些著书等身的作家，全集卷帙庞大，若非家拥厚赀，往往不能全数刊行，以致身后遗留的稿本远多于刊本。比如关中名士康乃心，生前刊有《莘野诗集》和《三千里诗》，后民国间印《关中丛书》第三集收入《莘野先生遗书》二卷，仅此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乃心《莘野先生遗书》稿抄本，多至三十册，系乾隆间子弟门人汇辑遗稿，内收像赞、题辞、总目、《莘野志》，《毛诗笺》、《四书黄河录》（残缺）、《居易堂家祭私议》（以上正编）、《订顽录》（未成之书，残缺）、《太乙子》（残缺）、《莘野诗集》、《续集》、《莘野文集》、《续集》及《河山遗文》（以上内编），前列李颙、顾炎武、王士禛、徐嘉炎、钮琇、李因笃、王御天、冉觐祖、路一麟诸人序及自作历年诗跋，顾炎武等序不见本集。诗凡见于《三千里诗》的题下都注明，见于《莘野诗集》者则注“刻”，附有各家评语。类似这样的稿本、抄本是清代诗文集中最珍贵的部分，一则有大量未刊稿本，二则有溢出传世刊本的佚作，三是保留了各家序跋、评语。一旦正式刊行，其中一部分内容就可能会被删去，因此从文献的角度说，这类稿抄本是最有价值的。

正如前文所说，诗文集的刊行意味着定稿，经过遴选和润色，它们与稿本必有若干不同。世传有些稿抄本，或因写作年代不同，或经作者删削，与刊本出入极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夏荃抄吴嘉纪《陋轩未刻诗》一卷，就有刊本未收的作品。夏荃《退庵笔记》卷九曾载这部稿本“吴野人先生《陋轩诗》，自缪君竹痴重刊后，稍知先生者几家置一编矣。然先生诗实不止此，东陶施丈井亭藏《陋轩未刻诗》二册，一为孙豹人手订，一为陋叟自抄。乾隆戊子宫丈节溪游东淘，于井亭处见之，携抄本归。丈有《读陋轩未刻遗稿》五言古及《题陋轩续集》小引，称其手书楷字，笔法古拙可宝。宫丈文孙枚波与余为僚婿，取此本赠余，前二十三叶先生自抄，体兼隶楷，古趣盎然，即之寥寥数十叶，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几于活现纸上，古物可贵如此。后五十叶他人书，计诗三百六十余首，其已见《陋轩诗》刻者约十之一，余诗多可传。宫丈曾三选，得诗百七首，拟另录附于《陋轩诗》刻后。顷余取全帙详加遴汰，得诗百二十余首，与公丈选小异。窃谓抄不如刻，拟取所选另刻单行本，名曰《陋轩诗补遗》，与全集相辅而行。”[9]后夏荃得缪中一草亭重刊《陋轩诗》版，乃将所选佚诗编为续集二卷附刊于后[10]。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王韬《蘅华馆诗录》绿丝栏稿本四卷，收诗四百三十二首，写作年月起讫略同于弢园丛书所收重订本六卷的前四卷，但具体篇目略有出入。如卷一多长诗《花朝祝花词》、《自海上寄醒逋》其二、三，卷二多《除夕集天风草堂谨同涤盦师韵》其二，《有题》二首、《重有题》二首、《应二将适海外以山水画册赠之媵以绝句》换作《笙村纪梦》二首、《重纪梦》二首，《赠碛溪胡大即和其韵》三首、《袁孝子诗》换作《简胡舒堂广文》，卷三多《赠尹大》三首、《拟陆剑南题十八学士图》，卷四多《有感时事并简李大四首》小序及其二、四，卷四《贫富交》，共存佚诗二十三首。稿本诗题原有人物字号，刊本都删去，遂无知人论世之资，由此见稿本之可贵。

由于时代不远，清人别集的稿本和刊本都留存较多，各种本子所收篇目和文字乃至附录往往有较大差异，于是相对准确意义而言的文献价值意义上的校勘就变得重要起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唐宋以前的别集。因此，我们在调查清代诗文集时，不仅要尽可能地查阅不同版本，有条件时最好能检阅同一版本的不同藏本，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澹宁

斋集》的作者杨际昌，事迹见汤纪尚《槃薖文甲集》所收传记，未载生卒年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乾隆刊本《澹宁斋集》，有杨氏后人手跋，详述先祖生平著述，载其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庆九年（1804）。这就是作者家藏本的特殊价值。又如顾图河《雄雉斋选集》，通行为康熙间刊六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却配有续集抄本一册，后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张四教手跋，云："花田太史为教王母之从父兄，又母之世父也。昔舅氏授以此册，藏之二十余年，偶于友人家得见太史改抹手迹，盖晚年意有未安，再加审定者，借归敬临一过。太史尚有续集未梓，当合此中所收者，重锓一本。教有志焉，而未能也。"考《清人别集总目》，《雄雉斋选集》并无续集流传，此本所附的续集应是未刊稿抄本，值得珍视。这种情形在清代别集中是不鲜见的，搜集材料时应加注意。

①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 90 页，齐鲁书社 1989 年版。
②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 49 页。
③延君寿《老生常谈》，《清诗话续编》第 3 册第 179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王士禛《蜀道驿程后记》卷上载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故人子侯稷山文灿来，致予合集，侯刻之梁溪者"，即此书。
⑤郑燮《郑板桥集》第 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⑥李洽《夜谈追录》卷二，光绪六年刊本。
⑦乾隆初方世举《兰丛诗话》尝称望溪"兄以文胜而诗居功半，今藏于家"，则望溪实有诗稿留传，后人未能保先世手泽耳。
⑧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 149 页。
⑨夏荃《退庵笔记》，海陵丛刻本。
⑩参看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编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上接第 82 页）

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有"罗孝"（Lo-hau）一名，见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p. 30.
㉟李志刚：《信义宗教会教士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第 337 页。
㊱王元深：《圣道东来考》（写于 1899 年），香港《景风》总 34 期，1972 年 9 月，第 39—40 页。
㊲苏精：《郭实腊和其他传教士的紧张关系》，《上帝的人马：19 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年，第 51 页。
㊳Jessie Gregory Lutz，*Opening China，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pp. 160-161.
㊴《粤东施蘸圣会例式》，转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610 页。
㊵*The Indo-Chinese Gleaner*，No. 16，April，1821，pp. 97-105，转引自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211 页。
㊶Charles Gutzlaff，*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1833*，London：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1834，p. 108，p. 115，pp. 278-279.
㊷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p. 76.
㊸Donald 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 558.
㊹参见王韬：《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7、152 页。
㊺Donald 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p. 558.
㊻John R. Hykes，*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American Bible Society，1916，p. 42；Kenneth S.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p. 266.《新约全书》，上海美华书馆活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香港浸会大学藏。
㊼㊽司德敷等编：《中华归主》下册，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41 页。